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爭論中的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

Contending IR Studies on the Field of "Strategic Culture"

doi:10.30390/ISC.201212_51(4).0004

問題與研究, 51(4), 2012

Issues & Studies, 51(4), 2012

作者/Author：黃恩浩(An-Hao Huang)

頁數/Page：95-12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12_51\(4\).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12_51(4).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爭論中的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

黃 恩 浩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頂尖大學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探討戰略文化研究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的發展與理論定位之相關問題。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乃源自於軍事歷史學者對國家戰爭方式與作戰傳統之探討，並開始蓬勃發展於 1970 年代的冷戰時期。在社會科學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戰略文化的研究方向是企圖在以物質為基礎的現實主義論述外，強調從文化意念與歷史途徑的角度，探討國家行為者在國際環境中的戰略行為模式根源。目前，西方關於戰略文化研究的文獻相當多，但在這豐富的文獻中迄今仍尚未產生一個共同而且被接受的戰略文化概念，這因此使得國家戰略行為在國際關係文化面向上的研究仍然處於百家爭鳴莫衷一是的狀態。近年來，在國際關係中的文化研究已經逐漸被視為是一個影響國家行為模式的重要分析面向。然而在主流現實主義的影響下，學界對國家行為的研究，似乎都太著重於分析物質的國際結構與國家實力對國家軍事戰略行為的影響，非物質的文化意念層面因而成為鮮少被探討與重視的要素。基於此，本文乃嘗試從戰略文化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分析其與主流現實主義的互動，重新檢視戰略文化在國際關係研究上本質，並探討其理論朝向社會建構主義發展的未來可能方向。

關鍵詞：戰略文化、戰爭方式、國家行為、結構（新）現實主義、社會建構主義

* * *

壹、前 言

近年來，文化研究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已經被視為一個影響國家行為模式的重要分析面向。然而在過去主流結構（新）現實主義的影響下，學界對國家行為的研究，似乎都太著重於分析物質的國際結構與國家實力對國家軍事戰略行為的影響，在以往研究國家戰略行為與軍事決策中，非物質的文化層面因而成為鮮少被探討與重視的要素。就文化對國家軍事戰略行為之重要性而言，江憶恩（Alastair I. Johnston）曾舉例

* 本文獲得國立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部分經費支持。

說明：①前蘇聯軍事行為所顯示出來的是一種先發制人與攻勢性使用武力的偏好，這主要是受到嚴峻的地理環境與輸出革命之信念所影響；美國軍事行為則傾向以彌賽亞式的方式使用武力，這與美國信奉戰爭是人類互動偏離常軌的行為，並與基督教思想中之道德主義相關；中國戰略偏好則強調有節制地、防禦性地，以最小限度使用武力以獲得最大戰略利益等，這與中國古代孔孟思想影響下的軍事思想、治國方略與自滿的世界觀相關連。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文化對國家戰略行為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性。②

「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 一詞，最早是由學者史奈德 (Jack L. Snyder) 於 1970 年代冷戰期間所提出，用以解釋蘇聯軍事戰略行為並非是依據領導人的理性抉擇，而是受到文化的制約。這個戰略文化概念在史奈德提出之後乃引起一些軍事戰略學者的共鳴，像是布斯 (Ken Booth) 與葛雷 (Colin S. Gray)。③此後，這概念乃逐漸被視為是探討國家戰略行為的相關重要條件。然而，在主流國際關係強調結構現實主義與行為主義的雙重影響下，大多數國際關係戰略研究都集中在以國際體系結構為變量 (variable) 來探討國家行為，因此造成文化研究在國際關係領域中被邊緣化。於 1990 年代中期，自江憶恩強調運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戰略文化，以求更精準解釋並預測國家戰略行為模式之後，戰略文化議題因此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更引起了兩次針對戰略文化研究的辯論。④第一次是歷史戰略文化研究與科學戰略文化研究的辯論，其主要是探討戰略文化理論建構與方法論上的議題。第二次是現實主義學者與戰略文化學者的相互質疑，其辯論焦點是在探索影響國家戰略行為的要素，究竟是國際環境結

註①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p. 1.

註② 國內關於戰略文化研究專書主要是以碩士論文為主，並且大多以中國軍事歷史為研究主體。從 2000 年迄今，可以發現到這類的研究論文並不多見。第一本關於戰略文化的碩士論文是劉順銘的《從戰略文化觀點探討中共軍事戰略與用兵動因》(國防管理學院, 2000 年)，其他相關代表著作有：江信良,《中共積極防禦戰略—從戰略文化探究》(淡江大學, 2003 年)、石吉雄,《價值與現實的匯流：中共武力使用的戰略文化內涵》(臺灣大學, 2004 年)與最近林棟義的《中共對外動武模式之研究—從戰略文化途徑研究探討》(政治大學, 2010 年)等。從 1996 年迄今，相關期刊論文約有十餘篇。最早是由莫大華所發表，代表著作有：「中共戰略文化初探」,《中國大陸研究》,第 39 卷第 5 期 (1996 年 5 月), 頁 38-52；「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6 期 (1996 年 6 月), 頁 39-52；「戰略文化與國防政策—中華民國的戰略文化與軍隊文化」,《國防政策評論》,第 1 卷第 4 期 (2001 年 4 月), 頁 33-56。其他相關代表著作有：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 (2006 年 1 月), 頁 197-230。沈明室,「中共軍事研究的戰略文化途徑」,《國防政策評論》,第 5 卷第 4 期 (2006 年 4 月), 頁 108-135, 以及最近梁震宇,「我國戰略文化之淺析」,《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47 卷第 518 期 (2011 年 8 月), 頁 24-34。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38~1842」,《中國大陸研究》,第 54 卷第 4 期 (2011 年 12 月), 頁 1-27。

註③ 代表著作：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London: Croom Helm, 1979)；Colin S.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Fall 1981), pp. 21-47.

註④ 依筆者觀察，第一次戰略文化的辯論主要是葛雷與江憶恩的在學術期刊上的筆戰，而第二次辯論則是集中在少數學者之間，例如：現實主義者德士奇 (Michael Desch) 與文化主義者杜斐爾 (John Duffield) 的論戰。

構還是國家本身文化傳統，以及戰略文化是否能取代或補充現實主義的論述等議題。儘管此次辯論的規模不大，也沒有任何結論，但是論述的議題卻能夠讓學者瞭解戰略文化研究的本質與不足之處。

西方關於戰略文化研究的文獻很多，但是對戰略文化概念之界定卻是相當分歧，其理論定位因此處在一種爭辯的狀態中，並造成了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戰略文化的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其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的發展過程又如何？有可能取代或是強化現實主義的論述嗎？最後，其未來建構理論的可能發展方向又為何？爲了能夠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本文乃分成四個部分進行論述：一、探討戰略文化概念之形成。二、分析戰略文化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發展過程。三、探究戰略文化與結構現實主義之相容性問題。四、戰略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之初探。

貳、概念之形成：從「戰爭方式」到「戰略文化」

戰略文化研究的概念淵源主要是來自於對戰爭方式的研究。英國軍事戰略家李德哈特（Sir Basil H. Liddell Hart）早在 1930 年代就從歷史經驗的觀點提出一個「戰爭方式」（ways of war）之系統化概念，並且用以解釋英國傳統的戰爭方式。在李德哈特回顧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On War*）的同時他曾經提出批評，他認爲克勞塞維茲的戰略觀念最大的謬誤就在於提出以絕對戰爭直接對抗敵人的主要武裝力量。^⑤在對英國軍事戰略歷史的研究中，李德哈特主張「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戰略概念，並且將此概念等同於英國軍事武裝對抗之傳統戰略行爲途徑。他認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期間，英國在西線軍事上的失敗主要歸咎於英國軍事戰略偏離了其自身傳統戰爭方式所造成之結果。^⑥在第二次大戰（1939-1945）期間，由於當時間接路線戰略概念在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戰略表現中，如寓言般地呈現在李德哈特早期的著作中，並且有效牽制了德國的閃電戰與機械化戰爭，這因此奠定了李德哈特在軍事戰略研究上的名譽與地位。不可否認，李德哈特對英國軍事戰略行爲精闢的研究，提出不同於克勞塞維茲戰略思想的間接路線戰略觀點，這在戰略研究領域中的確有其貢獻之處。可惜的是，李德哈特的研究只集中在英國的經驗上，並未對其他國家之戰爭方式進行探討。^⑦然而，英國歷史學者與軍事作家卻在李德哈特的影響下，發表了許多從歷史角度探討國家戰爭方式研究的相關著作。

註⑤ Alex Danchev, "Liddell Hart and the Indirect Approach,"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3, No. 2 (April 1999), p. 317.

註⑥ *Ibid.*, p. 313.

註⑦ 李德哈特的重要相關著作有：*Serman: Solider, Realist, American*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29); *Foch: The Man of Orleans*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31); *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London: Faber & Faber, 1932); *Deterrent or Defense* (New York: Praeger, 1960); *The Liddell Hart Memoirs*, 2 volum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 1965).

繼李德哈特之後，戰爭方式之概念也影響了美國軍事戰略研究，像是美國軍事歷史學者偉格利（Russell Weigley）亦採用戰爭方式一詞來探討美國戰爭行為偏好。^⑧為了解美國的戰爭方式，他從美國革命戰爭到越南戰爭的歷史中找到一個廣泛的美國武裝行為模式，認為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為了對抗英國軍隊，主要是採取消耗戰的防禦方式，^⑨並結合了葛瑞尼（Nathanael Greene）的游擊戰觀念，^⑩此戰略最後牽制了英國軍隊，因而被當時的美國奉為圭臬。最後，這消耗戰觀念在南北戰爭時期被葛蘭特將軍（Ulysses S. Grant）的殲滅戰觀念所取代，^⑪在二次大戰中也被美國戰略家所採用，而美軍在越戰中殲滅戰概念的運用即是一例。偉格利對美國戰略方式之研究不僅主導了美國軍事史研究，對新生代的軍事史研究有著重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歷史角度的國家軍事戰略研究更造成一股研究風潮，例如：對中國、德國、俄羅斯以及印度戰爭方式的研究。^⑫

戰略文化研究始於 1970 年代末期，在上述軍事戰略研究背景之下，其最初論述的焦點是結合歷史與文化觀點，探討美蘇兩國在冷戰時期中核子戰略行為之異同。基本上，歷史與文化角度的軍事研究途徑都是為了企圖解釋國家戰略行為，所以兩者除了有著不可分割的研究背景。文化一詞在人類學上被界定是一個「集體」（collectivity）的特徵，^⑬史奈德借用此觀點創造出「戰略文化」一詞及其概念，^⑭並在 1977 年出版的蘇聯戰略文化（*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一書中率先提出。他對戰略文化的界定涵蓋了意向與實踐兩種慣性，^⑮並影響爾後各種戰略文化概念的發展。在此著作中，他反對用美國的邏輯論述來詮釋蘇聯的戰略決策，強調蘇聯戰略決策乃是受到其自身特殊的戰略文化所影響。史奈德將這戰略文化界定為「意念、有條件的情緒反應，與國

註⑧ Russell F. Weigley,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註⑨ *Ibid.*, pp. 3~4.

註⑩ *Ibid.*, pp. 18~19.

註⑪ *Ibid.*, pp. 144~152.

註⑫ 關於西方戰爭方式之研究的相關著作有：Frank A. Kierman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William P. Baxter, *The Soviet Way of Warfare* (London: Brassey's, 1986); Dennis E. Showalter, "From Deterrence to Doomsday Machine: The German Way of War, 1871~191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 64 (January 2000), pp. 679~701; Richard W. Harrison, *The Russian Way of War: Operational Art, 1904-1940*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G. D. Bakshi, *The Indian Art of War: The Mahabharata Paradigm* (Delhi: Sharada, 2002); Lawrence Sondhau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註⑬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2.

註⑭ 在 1970 年代，政治學界已經開始進行對「政治文化」的研究，並用這概念來解釋國家的運作。代表學者是 Sidney Verba 與 Gabriel A. Almond，其認為政治文化是經驗信仰、符號表達與價值體系所編織而成的體系。參見：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註⑮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77), pp. 8~9.

家戰略社群成員經由教導、模仿與彼此分享所獲得之慣性行為模式的總和。」^⑩這戰略文化一般概念 (general idea) 的提出，不僅取代了戰爭方式一詞，也使得戰略文化概念發展逐漸從軍事歷史領域走向國際關係領域。

理論上，結構現實主義的命題認為，國家戰略決策乃是一個國際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功能，主要受到體系中相對權力分配所制約。^⑪而戰略文化概念的提出似乎提供了在現實主義之外對國家行為研究的另一種選擇，在冷戰後期引起了許多學者對此概念的重視。自 1990 年代冷戰結束以來，結構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的論述開始出現其局限性，不僅無法預測東西方政治敵對關係的結束，也不能夠解釋為何國家戰略與軍事行為已經不完全為外在環境所約束。^⑫更甚者，物質的現實主義並沒有為國家戰略決策中之文化面向提供理論空間。^⑬這些種種因素使得近年來的意念研究 (ideational research) 迅速發展，並且顯示出在結構現實主義無法解釋的地方，戰略文化的重要性就在那裡，^⑭進而能夠解釋國家特定的軍事行為模式在特定情境下是根據其行動觀念 (perception) 所造成的。

目前戰略文化研究發展還尚未成熟，在探討國家軍事與安全戰略時，其分析能力是否比其他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途徑為佳，其理論應該如何去建構，以及其未來定位方向為何等等問題，都曾經引起探討。史奈德曾悲觀地表示，不要將戰略文化概念濫用於解釋國家行為。^⑮雖然他首先提出這個概念，但是他質疑美蘇兩國的戰略到底有多大的差異性，並且懷疑這戰略文化概念在分析國家行為時到底有多大的助益。他指出，在國際關係研究上，文化是一個最不得已的解釋，僅能解釋那些已經不能再被具體論述的東西，是一個當所有解釋途徑都失敗時的備用概念。^⑯史奈德認為研究不同國家在軍事戰略行為上之差異，應該先從獨立且客觀的國家內外環境結構來探討之，而不先涉及主觀上的文化因素分析。他主張文化因素只能適用在當某一個國家戰略被確定之後，用來解釋此種戰略形態如何根深蒂固的影響到國家軍事建制、軍隊訓練與軍事行動等等層面。如果客觀的現象也要用文化的角度來解釋，文化研究途徑將會像是一把

註⑩ 原文為：“The sum total of ideas,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patterns of habitual behaviour that members of a national strategic community have acquired through instruction and imitation and share with each other.” 參見：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77), p. 8.

註⑪ Lawrence Sondhau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24–125.

註⑫ John Duffie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ur: Why Germany Confounds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Vol. 53, No. 4 (September 1999), p. 767.

註⑬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pp. 3–18.

註⑭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a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Spring 1999), p. 55.

註⑮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Ken Booth and David R. Jones,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 pp. 3–9.

註⑯ *Ibid.*, p. 4.

變鈍的解剖刀。^②

對於史奈德之見解，布斯則撰文提出反駁，批判史奈德對戰略文化概念的扭曲，^③並再次確認戰略文化概念的價值。他認為戰略文化的重要性有六點：^④（一）它可以排除文化優越主義與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這正是造成對國家戰略偏好錯誤理解的原因。（二）它是戰略分析中知己知彼的必要條件。（三）它加深戰略研究對歷史的關注，有助於分析對方的戰略動機、自我形象與行為模式。（四）它能打破分析國家內政與國際關係之間的屏障，並且是國際關係結構與國家戰略機制的一個運作平台。（五）它有助於解釋所謂「非理性」範圍的國家行為偏好，並強化對不同國家文化的瞭解與溝通。（六）這文化的變量能增進對其他國家的認識，與對於來自其他國家威脅的理解，有助於在軍事戰略上做出正確的判斷。由於布斯對戰略文化重要性的重新詮釋，使得戰略文化研究在國際關係領域有了發展的基礎。

簡而言之，在「戰略文化」一詞出現之前，對軍事戰略途徑研究最初的方式乃是純粹歷史的觀點解釋國家「戰爭方式」或「軍事戰略行為」（military-strategic behavior）的持續性，企圖解釋及預測國家的軍事戰略表現。在「戰略文化」被提出並取代「戰爭方式」的研究之後，戰略文化研究便開始包含對各種國家安全與戰略行為之研究，並不再被局限於歷史途徑的軍事研究取向。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的層面，戰略文化研究乃是為探討，決策者如何運用綜合的權力（外交、經濟、軍事等）為工具，在與他國的合作或競爭的過程中，達成國家的政治目標之一套價值體系。

參、走向國際關係領域的戰略文化研究

在史奈德之後，戰略文化概念在方法論途徑（methodological approach）的基礎上大致可分為兩大類。^⑤第一類研究是屬於「廣泛描述」（board descriptive）的研究，這類文獻出現於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之間，其主要是涉及以廣泛的歷史分析對國家戰略行為模式進行探討，將國家行為歸因於文化驅力，並認為這會影響到國家未來的戰略取向。第二類研究是屬於「分析學派」（analytical school），這類文獻開始出現於 1990 年代，其目的是提供一個能夠替代第一類研究的途徑，這類研究採取較狹隘的文化定義及較嚴格的方法來測試與分類國家戰略行為。這類途徑在個案研究上被視為必須，但是在以利益優先的理性行為者模式與現實主義者之界定下，卻無法適當解釋特殊的國家戰略選擇。^⑥基本上，戰略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探討國家戰略偏好與軍

註^② *Ibid.*, pp. 5~6.

註^③ Ken Booth,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Carl G. Jacobsen, Ken Booth, and David R. Jones,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 pp. 124~126.

註^④ *Ibid.*, pp. 121~130.

註^⑤ Forrest E. Morgan, *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 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stport: Praeger, 2003), pp. 6~7.

註^⑥ Rashed Uz Zaman, "Strategic Culture: A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Wa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8, No. 1 (March 2009), p. 73.

事行爲，並將國家行爲產出視爲戰略文化的「依賴變量」(dependent variable)。但戰略文化究竟是國家行爲的「獨立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還是「中介變量」(intermediary variable)，學者間則有不同的看法。迄今戰略文化研究在國際關係領域已經歷經了三階段發展演變，^⑧下文將探討三代戰略文化的研究重點，並反思戰略文化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發展。

一、決定論的第一代戰略文化

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主要是發展於 197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期之間。在此期間的戰略文化研究主要是在探索美蘇兩國發展不同核子戰略的根源，認爲戰略文化是固定不變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也是影響美蘇兩國戰略的決定性因素。第一代的代表學者有：爾馬斯 (Fritz W. Ermarth)、布斯、葛雷、洛德 (Carles Lord) 與瓊斯 (David R. Jones) 等人。^⑨

戰略文化概念被提出後，爾馬斯首先注意到，蘇聯人對戰略與核戰的觀點與美國人是不相同的，美國戰略思想家們要瞭解蘇聯的戰略有一定的難度。^⑩他注意到假定美蘇戰略思想是相似的，或者是會隨著時間發展而趨同，這方向將會阻礙進行對兩國戰略觀點之比較。爾馬斯將這種假定 (assumption) 視爲美國「文化自我中心」(cultural self-centredness) 的延伸。^⑪這文化中心主義的觀點被認定後，布斯接著在《戰略與民族優越感》(*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一書中探討這個議題，認爲戰略研究籠罩在文化要素中，造成戰略理論與實踐相衝突而無所適從。^⑫他認爲應該著重在分析國家的特別風格 (idiosyncrasies) 與形態 (styles) 才能從不同國家或民族集團的觀點來瞭解世界。此外，觀察者不能完全地消除他本身的文化條件、價值與意念結構，因此需要彼此尊重，這就是所謂的「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這亦有利於戰略研究。^⑬簡言之，布斯的觀點強調要以他者之觀點爲分析戰略的背景，而非是以自我的觀點而爲之。雖然布斯指出文化相對主義在戰略研究上的重要性，卻沒有對史奈德戰略文化觀點作更深入的論述。

葛雷是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的箇中翹楚，他從歷史途徑去深入探討戰略文化，^⑭並

註 ⑧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 4.

註 ⑨ 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的代表著作有：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London: Croom Helm, 1979); Colin S. Gray, "National Styles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Fall 1981), pp. 21-47; Colin S. Gray,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tyle* (Lanham: Hamilton Press, 1986); Carles Lord,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5, No. 3 (July 1985), pp. 169-293; David R. Jones,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n Carl G. Jacobsen, Ken Booth, and David R. Jones,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5-49.

註 ⑩ Fritz W. Ermarth, "Contrasts in American and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 No. 2 (Autumn 1978), p. 138.

註 ⑪ *Ibid.*, p. 140.

註 ⑫ 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London: Croom Helm, 1979), p. 9.

註 ⑬ *Ibid.*, p. 16. 文化相對主義的核心是主張尊重不同的文化差異，並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流。

註 ⑭ Colin S.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1981), pp. 21-47.

將其界定為是「持續社會傳遞之意念、態度、傳統、思想習慣、偏好的方法，這些或多或少在安全社群中都有著在地理基礎上的特殊性」。^⑤在以美國國家戰略為研究背景之下，葛雷認為美國歷史經驗產生了「對於武力使用的思想與各種行動模式」，^⑥亦造就了一組獨一無二且固定不變的「支配性國家信念」與一個清晰的美國核子戰略選擇途徑。^⑦他認為國家形態（national style）是一個對國家行為持久的解釋，戰略文化則提供了一個戰略辯論的背景，是戰略政策模式的一個獨立決定因素。^⑧同樣地，瓊斯以前蘇聯國家戰略為研究背景，認為決定一個國家戰略文化的形成有三個重要的層次：^⑨

（一）宏觀環境的層次：地理、歷史與民族文化的特徵。這宏觀層次對戰略決策者的戰略偏好與傾向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進而形成國家的軍事戰略信念。（二）社會經濟特徵與政治結構層次：強調國內政經發展對國家戰略偏好與行為的影響，且歷史上任何軍事變革都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息息相關，更會影響到國家軍事戰略思想的構成。^⑩（三）微觀層次：軍事制度與文武關係之特質。這層次主要集中在制度分析層面，認為在軍事制度中之文武關係的互動會反映在國家的戰略偏好與行為模式。

第一代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歷史決定論上，所以本文將此階段稱為決定論的戰略文化研究。儘管第一代研究方向是以史奈德的論述為依歸，但是第一代研究與史奈德的觀點存有一定的差異性。首先，史奈德並沒有將戰略文化絕對化，他只將戰略文化視為一種認知取向的因素，而第一代研究主要是將戰略文化視為國家戰略抉擇的一種靜態的決定性因素，也將戰略文化視為國家行為之獨立變量。再者，史奈德認為戰略文化是最近歷史經驗、意識形態、政治利益與地理環境等因素所造成，而第一代研究則視戰略文化為深植於國家歷史中的文化經驗產物。雖然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積極建立這個歷史決定論的宏觀戰略文化，但是其對戰略文化的研究只是等同於「單一化」（homogenized）的國家形態與戰略制訂過程，^⑪並且結合對國家形態公式化的固定思維。因此，第一代研究並未探討跨國的戰略文化差異，在戰略文化研究領域則留下了一個可論述的空間。

註⑤ *Ibid.*, p. 21.

註⑥ *Ibid.*, p. 22.

註⑦ Alastair I. Johnston, "Think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19, No. 4 (Spring 1995), p. 34.

註⑧ Colin S.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p. 35.

註⑨ David R. Jones,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n Carl G. Jacobsen, Ken Booth, and David R. Jones,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5-49.

註⑩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No. 1 (Fall 2002), p. 90.

註⑪ 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強調歷史決定論，其假設文化對國家軍事戰略行為有著主導性作用，因此其認為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會產生同樣的國家行為，而這就是所謂的將國家行為類型單一化或同質化。從這第一代決定論的戰略文化研究中並不能瞭解到戰略文化的跨國且多元化之差異。

二、工具論的第二代戰略文化

第二代戰略文化研究主要盛行於 1980 年代中期至末期，代表學者有：克萊恩 (Bradley S. Klein) 與陸克漢 (Robin Luckham) 等。^②其解釋途徑主要在「陳述」(declaratory) 與「操作」(operational) 為工具之基礎上，探討政治菁英對戰略文化的塑造，因此本文稱這一階段為工具論戰略文化研究。

第二代研究主張在「陳述」戰略的基礎上提供一個對戰略文化制度性之解釋。主要是指領導菁英對於國家戰略作為之主觀想法或言詞，在「操作」戰略的基礎上解釋國家的安全政策，並分析領導菁英在實際戰略作為之對策運用。^③在研究美國安全政策之背景下，克萊恩認為美國戰略制訂中的操作面向，在表面上是藉由強調防禦美國支配性利益的戰爭所產生，但實際上為了制訂軍事戰略，其對戰略文化的陳述主要是由政治菁英所支持（或反對）所產生。也就是說，在文化與語言方面，政治菁英可以在制訂軍事戰略過程中擷取可被接受為正當的理由，以及消除潛在政治力量的挑戰，進而創造出在軍事決策中的一個支配性文化語言。^④在跨國分析中，不同國家因此存在著不同的戰略文化語言。

第二代戰略文化研究是菁英的陳述與操作方式之呈現，並且是形成與維持政治霸權的工具。這不僅使戰略決策者能夠握有戰略上的話語權，以合法化他們的權威，亦合理化了他們在政治領域上使用武力的理由。在國際關係研究上，其主要是採取「葛蘭西式」(Gramscian) 的角度來分析大國戰略文化，認為軍事戰略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是反映了一種國際關係的霸權秩序。戰略文化涉及到可能的暴力傾向，以及國家合法使用暴力遏止潛在敵人的方法，所以研究戰略文化就是研究國家有組織的文化霸權。^⑤此外，陸克漢更將戰略文化解釋為一種「武器文化」(armament culture)，戰略文化並非是單一國家歷史發展經驗的產物，而是全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產物。他認為戰略文化是一種「武器崇拜主義」(weapons fetishism)，這種意識形態在現代化武器、軍事優越與國家安全之間建立起一個實質且合理化的因果關係，並滲透到人類各層面。這武器文化主要是為它的創造者（決策菁英）服務，所以這文化是跨國性的，並表現在全球層次上的工業化與軍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⑥

與第一代不同的論述在於，第二代認為戰略文化與國家實際戰略行為間存有根本

註② 第二代戰略文化研究的代表著作有：Bradley S.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14 (1988), pp. 136-139; Robin Luckham, "Armament Culture," *Alternatives*, Vol. 10, No. 1 (January 1984), pp. 1-44.

註③ Bradley S. Klein, "The Textual Strategies of Military: Or Have You Read Any Good Manuals Lately,"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pp. 97-109.

註④ Bradley S.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14 (April 1988), pp. 136-139.

註⑤ *Ibid.*, 136.

註⑥ Robin Luckham, "Armament Culture," pp. 1-2.

的斷層，戰略文化只是決策菁英制訂戰略政策的工具，用以合法化他們的政策制訂過程與目的，因為其包含對軍事戰略在文化上可被接受的解釋，克萊恩因此將其稱為「文本戰略」(textual strategies)。第二代研究結合言語之重要性，分析戰略文化與國家行為，並考慮了戰略文化在跨國之間的變異性，其研究也超越了第一代研究對國家類型的「單一性」(homogeneity) 假設。再者，這一代研究認為戰略文化是由政治菁英所建構，而菁英們卻被自己建構的文化所社會化，結果使得本身決策亦受到自訂的戰略文化功能所制約，這個過程使得戰略文化傳承不受菁英控制。換言之，第二代研究視戰略文化概念是深植於現實政治中，是政治與組織文化的產物，其主張戰略思考和戰略決策制訂是由物質的政治力所驅動。第二代研究遺留下來的問題是，菁英是否能夠超越戰略文化的限制，或者只能被社會化於其所制訂的制度迷思中。^④這個問題因此留給了第三代研究探討。

三、後實證主義的第三代戰略文化

第三代戰略文化研究開始於 1990 年代，又被稱之為「後實證文化主義」(post-positivist culturalism) 或是「配置的文化主義」(configurative culturalism)，認為知識並非只屬乎科學實證，文化要素可以被視為國家行為一個意念上的中介變量。在研究上，除了要超越前面兩代研究之觀點外，第三代主要還是針對戰略文化是工具還是原因之問題進行探討。為了追求概念上與方法論上的嚴謹性，這代研究對戰略文化作用建立了可信賴且有效的實證測試，縮小了依賴變量的焦點，並更廣泛地探討的個案研究。^⑤代表學者有：列葛羅 (Jeffery W. Legro)、柯爾 (Elizabeth Kier)、卡贊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隆賀斯特 (Kerry Longhurst)、摩根 (Forrest E. Morgan) 與江憶恩等。^⑥

第三代主張戰略文化是根植於最近的經驗而不是歷史，所以戰略文化並非是固定的，而是可變化的。在分析上，第三代強調理論驗證與對比，企圖超越對以國家為單位的分析，例如：列葛羅就驗證比較了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與組織文化對國家行為的解釋，其發現不同國家的軍事行動主要是取決於不同的組織文化。^⑦柯爾則將結構現實

註④ Alastair I. Johnston, "Think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p. 40.

註⑤ Rashed Uz Zaman, "Strategic Culture: A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War," p. 74.

註⑥ 第三代戰略文化研究的代表著作有：Jeffery W.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izabeth Kier,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65-93;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Kerry Longhurst,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Forrest E. Morgan, *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 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stport: Praeger, 2003).

註⑦ Jeffery W. Legro, "Military Culture and Inadvertent Esca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Spring 1994), pp. 108-142.

主義、官僚組織理論與戰略文化進行對比分析，認為國內政治文化包括各種分歧的使用武力方式，這分歧主要是奠基於國內的政治考量而非是外在環境。^{⑤1}江憶恩亦同意，由這以國內為取向的戰略文化出發，將可以有效解釋一個國家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淵源。^{⑤2}卡贊斯坦在《國家安全文化》（*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一書中視國家認同與行為規範為影響國家戰略決策的獨立變量。根據此觀點，文化不僅是一套評量標準（a set of evaluative standards）—規範與價值；文化亦是一種認知的標準（cognitive standards）—行為者在體系中生存的規則與模式。^{⑤3}不同的認同與規範都是在文化背景下運作，決定了每個國家制度與對外關係的發展。因為戰略決策無法脫離文化母體而存在，規範與認同實際上會限制決策者的戰略抉擇選項，所以第三代戰略文化可以說是以探討組織文化與國防戰略之互動關係為主要取向。江憶恩認為這種研究趨勢提供了一種對戰略文化詮釋性的分析，並在解釋戰略決策時結合了象徵（symbols）的角色。^{⑤4}

雖然江憶恩本人指出，他是以局外人的角度來分類三代戰略文化研究，並不認為自己是屬於第三代，^{⑤5}但是他對同時期戰略文化研究的影響力卻遠遠超過第三代。此外，這一時期研究主軸是著重在驗證戰略文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所以無論從理論設計、嚴謹方法論建構與經驗實證之角度來看，江憶恩可被視為是第三代的重要代表學者。他認為這代研究克服了前兩代的缺失，例如：第三代研究傾向在研究上走向嚴格與折衷的途徑，並且縮小研究焦點至特殊的國家戰略選擇部分。雖然此代學者專注於一組相當廣泛的戰略文化研究類別，例如：軍事文化、安全文化、政治軍事文化與組織文化等等，但是他們皆一致性地指出現實主義理論關於利益結構性的定義無法解釋特定的國家戰略選擇，而他們的研究就是企圖在現實主義外另尋出路。

第三代與第一代研究最重要區別即，前者將文化要素視為獨立於國家行為之外的研究變量，而後者卻認為這是無法區分的。在戰略文化的界定上，前者傾向於視最近國家的實踐經驗為戰略文化價值的根源，而後者則傾向深入地連結歷史文化背景。^{⑤6}這分歧的見解因此造成第一代與第三代的辯論。這一場世代辯論始於江憶恩對第一代研究的批評，尤其是指葛雷的論述。江憶恩指出，將戰略文化視為所有事物的總和，這因此很難去界定非文化（non-cultural）要素；^{⑤7}再者，用一個獨特、持續、綜合的戰略

註⑤1 Elizabeth Kier,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65-93.

註⑤2 Alastair I. Johnston, "Think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pp. 32-64.

註⑤3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6.

註⑤4 *Ibid.*, pp. 33-75.

註⑤5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 22.

註⑤6 *Ibid.*, pp. 18-19.

註⑤7 *Ibid.*, p. 13.

文化概念去解釋所有戰略選擇，這似乎是相當危險的決定。^{⑤⑧}面對江憶恩的批判，葛雷乃以「遲來的第一代發展調查」(belated development of first generation enquiry) 進行回應，^{⑤⑨}他質疑江憶恩把戰略文化與國家行為分開探討之主張是無意義的，戰略文化應該被視為，「一個存在的背景，其圍繞著戰略行為並賦予其意義，如同將整個戰略事務包圍與編織在一起。」^{⑥⑩}換句話說，葛雷認為戰略文化是國家行為的一個背景(context)，其本身也是行為構成的要素；^{⑥⑪}而江憶恩的錯誤就在於將文化從戰略選擇中的解釋獨立出來，這因此無法解釋戰略文化的全貌，因為所有的國家戰略行為都受人類文化所影響，每個人亦不得不成為文化的代理人(agent)。^{⑥⑫}雖然葛雷嚴厲的回應江憶恩的批判，但是他對於江憶恩對戰略文化研究方法論上的努力則是相當稱許。^{⑥⑬}

在這場辯論之後，第三代研究仍未提出新的看法，像是隆賀斯特與摩根對戰略文化的個案研究，大多還是著墨於文化與安全政策制訂之間的關係。隆賀斯特主張戰略文化應包括基礎成分、安全政策與常規實踐(regulatory practice) 三方面，政策制訂者並非戰略文化的囚徒，他們瞭解其本身戰略文化的背景，但是不能與其戰略文化基礎成分相抵觸，然而他們卻可以透過修正常規實踐來適應這基礎，所以會有國家行為偏好與戰略文化不一致的狀況。^{⑥⑭}摩根認為文化不能起著獨立的作用，文化的確會對行為造成影響，但是並非是直接的構成因素，決策者不僅僅是對戰略文化做出反應，而且也是對環境的影響做出反應。^{⑥⑮}迄今，戰略文化研究在時間順序上已有三代發展成果，但各代間並未有相互取代的現象，所以戰略文化研究迄今是處於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戰略文化的界定雖然存有不同的面向，但是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在探索戰略文化由內而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以及對由內而外之國家行為理論探討，其共同分析要素包括：以國家為分析單元、強調非物質的文化傳統認知因素、重視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文化對國家行為影響等等。而在探討戰略文化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的互補與相容關係時，這些要素都是值得被重視的。關於不同戰略文化界定請參考附表。

註⑤⑧ Stuart Poore, "Strategic Culture," in John Glenn, Darry Howlett, Stuart Poore, and Darryl A. Howlett, eds., *Neo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p. 46-51.

註⑤⑨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a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Spring 1999), p. 49.

註⑥⑩ *Ibid.*, p. 51.

註⑥⑪ *Ibid.*, p. 50.

註⑥⑫ Stuart Poore, "What is the Context? A Replay to the Gray-Johnston Debate on Strategic Cul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2 (April 2003), p. 280.

註⑥⑬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a Context," p. 54.

註⑥⑭ Kerry Longhurst,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21.

註⑥⑮ Forrest E. Morgan, *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 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stport: Praeger, 2003), p. 8.

附表 戰略文化定義之整合比較

界定／學者		定義	變化	人員	影響
最初定義	史奈德	意念、有條件的情緒反應，以及國家戰略社群成員經由教導、模仿與彼此分享所獲得之慣性行為模式的總和。	其變化的發生不會直接地回應在不斷變化的戰略環境中，但是會間接地被早已存在的文化信念所調和。	國家軍事戰略社群的成員。	指導並約束戰略問題上的思考，影響已經形成的戰略議題並設定戰略辯論上的文字與概念參數。
第一代定義	布斯	一個國家的傳統、價值、態度、行為模式、習慣、象徵、目標，與根據環境而採取特殊方式並解決問題以回應威脅或使用武力。	是具持久性的，但是主要的變化是在於軍事科技，國內安排或是國際環境的變化。	最有影響力的政治菁英、軍事機構組織與公共輿論。	有助於形塑國家在國際政治上、對外在威脅上、文武關係上與戰略準則上使用武力的行為，但是不能在安全領域上決定國家之間的互動。
	葛雷	社會持續傳遞的意念、態度、傳統、思想習慣、偏好的方法，這些或多或少在安全社群中都有著在地理基礎上的特殊性；這些與制度、行為與背景都分不開關係。	當新的經驗被吸收、規範與文化上的轉譯，就會有一段長時間的變化。	一個具特殊地理意義的安全社群。	在特殊模式化的戰略行為樣式中找出詞語表達，這是行動的指導，戰略行為不能夠超越文化。
第二代定義	克萊恩	一個軍事集團考量戰事政治目標、有效戰略與達成之運作方式的一組態度和信念。	決定於戰略文化社會化在政治菁英中的傳承過程。	政治戰略的決策菁英。	使決策菁英者能夠握有戰略上的話語權以合法化他們的權威，也合理化了他們在政治領域上使用武力的理由。
第三代定義	江億恩	一個整合的意象系統（例如：論點、結構、語言、類比、隱喻），其運作目的是藉由在國際政治事務中形成軍事武力角色與效益概念，並藉由這些概念與環境現實結合，以建立全面性與永久性的戰略表現。	其發展是超越時間的，並且可以被追溯，只要可以觀察到是否決策者的繼承在基本的戰略文化規範下有著代代相傳的社會化過程。	基本上是指政策決定者，像是戰略家、軍事領袖與國家安全菁英。	其影響不能夠被假定，必須藉由實際的衡量行動（measuring actions），並以反對可否證的理論（a falsifiable theory）來表示。
	隆賀斯特	一個具有特色之使用武力信念、態度與實踐的整體，這整體由一個集體（通常指國家）所把持，其呈現於經由長時間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並逐漸地超越時間。	有著超越時代的持續性，它的原始開端有著永久的傾向，雖然它不是專屬的或是靜態的。它受到集體的經驗影響而形成。	集體的菁英與政策制定者。	具體的展現在於可觀察之政策的常規實踐。

資料來源：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77), pp. 8-9; p. 38. Ken Booth,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Carl G. Jacobson, et al.,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 121. Yitzak Klein, "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1 (April 1991), p. 5. Alastair I.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46-49. Colin S. Gray,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1-143. Kerry Longhurst,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18; p. 48.

就企圖超越現實主義的論述而言，第三代研究不僅在研究上嘗試提供比現實主義者較為豐富的國際關係論述，更提出以國內文化環境 (domestic cultural environment) 為基礎的戰略文化要素作為代替途徑 (alternative approach) 用以解釋國家行為的產出，企圖與結構現實主義者進行論述交鋒 (engage with) 並且要超越 (go beyond) 其論述。^⑥基本上，第三代學者嘗試挑戰結構現實主義者的論述，主要是藉由重複主張文化的、意念的與規範的重要性對國家及其領導菁英之行為動機的影響，試圖證明國際環境結構之概念無法完全解釋國家的戰略與軍事抉擇。^⑦關於戰略文化與現實主義相容與否的議題將於下文探討之。

肆、戰略文化與結構現實主義之相容性

前蘇聯於 1990 年代初期瓦解後，國際關係便進入了一個相對緩和的階段；同時，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也順勢多元化了起來，文化研究便開始受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視。這「回歸文化」(return of culture)^⑧之趨勢亦影響到國際關係中的戰略與安全領域。^⑨在這背景下，第三代戰略文化學者乃試圖建立超越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研究。然而，德士奇 (Michael Desch) 則對戰略文化提出質疑，認為戰略文化的分析要素不僅相當廣泛 (歷史經驗、國內文化、地緣戰略、國家資源等等)，也相當分散於各種層次中 (政治菁英、軍事菁英、種族文化等等)，這相當分歧又廣泛的要素將無法正確解釋國家行為。對於文化途徑是否能夠成為現實主義的取代途徑，他主張文化意念最多只能補充現實主義論述不足之處，而非是另闢途徑。^⑩德士奇觀點似乎推翻了文化學者的努力。然而，杜斐爾 (John Duffield) 卻提出反駁，認為不應該將物質的現實主義與意念的戰略文化推向對抗的極端，而應該是去探討兩造之間相容互補之可能性。^⑪

結構現實主義主張的國家戰略決策與行為的產出是依賴變量，主要是受制於非歷史與非文化的國際結構之獨立變量，像是國際體系結構、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實力與軍事武力等等。在國際結構與國家行為之間的中介變量 (或非物質變量) 則是很少被探討，像是國家官僚效率的表現、決策菁英的意念認知，與歷史文化意識等。因為結

註⑥ Tim Dunne and Brian C. Schmidt, "Re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42.

註⑦ Alastair I.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註⑧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關於國際關係文化論述的代表作是 Samuel P. Huntington 所寫的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一書。

註⑨ Jutta Weldes, Mark Laffey, Hugh Gusterson, and Raymond Duvall, eds., *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1.

註⑩ Michael Desch,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 141; p. 169.

註⑪ John S. Duffie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ur," pp. 771~773.

構現實主義並沒有為國家戰略決策與行為提供非物質因素的探討空間。所以，信奉現實主義的決策菁英在制訂或分析國家戰略政策時，就只能在理論上考察國家戰略物質的結構因素，這結果導致影響國家行為的文化因素，像是意念、信念與非正式規範等，在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中被忽略。不可否認，國家軍事戰略行為的確是受到體系結構與相對物質權力所影響。然而，這樣的權力因素對國家行為影響卻是複雜的，也是非直接的。因為外在的體系影響力必須經由上述的中介變量才能轉變成單元的動力。^⑭若忽視中介變量的影響力，則無法解釋為何國家間關係有時欠缺平衡，以及為何國家無法適當的去制衡他國權力的提升，原因就出在於客觀的國際環境與決策菁英對環境主觀意念認知的落差。所以國家間的平衡與否主要是受到國外環境與國內菁英兩方面所影響，若太過於強調前者，不平衡狀況就有可能發生。^⑮

戰略文化學者認為，戰略決策與國家軍事行為的產生不只是以客觀物質環境為取向，以文化意念取向之非物質要素亦是相當重要。因為國家戰略行為可以說是決策者的主觀判斷，不同的國家行為者、軍事組織或民族對待暴力與戰爭方式各有不同，因此構成戰略文化多元化的現象。^⑯戰略文化研究的興起雖然挑戰了主流現實主義之命題，但是它的興起並非要取代現實主義對國家行為的解釋，而是試圖在現實主義研究領域中提出文化面向的解釋，補充結構現實主義解決關於國家如何構思戰略行為及偏好等問題。在此觀點上，文化主義者觀點與現實主義者的觀點並不是相互競爭的。^⑰杜耶克 (Colin Dueck) 因此主張「文化最好是被理解為對現實主義戰略選擇理論的補充而不是代替，戰略文化可以特定地解釋國家平衡行為的偏差，因為這偏差的特定概念假設了一些對國際狀況相稱或期待的反應，這樣的解釋也只有現實主義框架中才有意義。」^⑱

當代現實主義典範已經慢慢對國際環境結構決定國家行為此一命題開始鬆綁，開始承認其他非物質要素的重要性。因為無政府狀態與體系極化無法完全決定國家行為，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也開始主張需要去結合其他的變量。^⑲為了探討戰略文化與現實主義相容與否的議題。^⑳此部分嘗試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下，分類探討結構現實主義與戰

註⑭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 146.

註⑮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6.

註⑯ Yitzak Klein, "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1 (April 1991), pp. 3~24.

註⑰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64.

註⑱ Colin Dueck,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p. 20.

註⑲ Anders Wivel, "Explaining Why State X Made a Certain Move Last Tuesday: 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Realis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No. 8 (December 2005), p. 357.

註⑳ John Glenn, "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September 2009), pp. 523~530.

略文化研究性質互補與否之問題，以便於瞭解戰略文化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未來發展的可能發展。

一、與結構現實主義互補的戰略文化研究

與現實主義互補的戰略文化可歸納為兩類：一、「附帶現象的」(epiphenomenal) 戰略文化研究，其目標是解釋結構現實主義預測國家行為一般模式的誤差 (deviations)。二、「一般建構主義者的」(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t) 戰略文化研究，其目標是以意念和文化規範為條件來探討國家行為通則 (generalizations) 產生的解釋要素。大致而言，這兩種概念主要是將戰略文化視為結構現實主義架構中的中介變量，其目的並非是為了要取代結構現實主義對國家行為的解釋，而是在物質現實主義的研究架構中補充探討影響國家行為文化要素。^⑦

(一) 附帶現象的戰略文化

這類研究主要是去確認國家為達成特殊目標所採取的軍事偏好並提出有限的解釋。在現實主義架構中這類戰略文化僅被視為一個補充性質的中介變量，此並不會挑戰到結構現實主義對國家戰略行為的論點。代表學者有：史奈德、范艾佛拉 (Stephen Van Evera)、葛梭弗 (Raymond L. Garthoff)、亞奈特 (Robert Arnett)、阿多梅特 (Hannes Adomeit) 與馬葛威爾 (Michael MccGwire) 等人。^⑧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立論基礎是視國際無政府狀態為國際互動之主要背景條件，衝突發生是永久可能的，因此國家會採取自助式的戰略來因應之。為達成確保國家安全，霍茲 (Kenneth Waltz) 認為國家有兩個手段可以達成這目的：「內部效能」(internal efforts) — 增加經濟軍事能力並發展有效戰略，與「外部效能」(external efforts) — 增強與擴大所屬之聯盟並弱化對手之所屬聯盟。^⑨霍茲亦強調國際間權力平衡造成於國家之間互動的行為模式，而國際環境正也提供這形成國家行為的充分必要條件。^⑩戰略文化在這主流的現實主義架構下，史耐德認為，這只能在現實主義預測長期國家戰略行為之偏差中，提供對短期國家行為的補充解釋。^⑪

註⑦ *Ibid.*, p. 530.

註⑧ 代表著作：除史奈德之外尚有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ummer 1984), pp. 58-107; Raymond L. Garthoff, *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0); Robert Arnett,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Nuclear War: Do They Really Think They Can Wi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Research*, No. 2 (September 1979), pp. 172-192; Hannes Adomeit, "Soviet Risk Taking and Crisis Behaviour," in John Baylis and Gerald Segal, eds., *Soviet Strategy* (London: Croom and Helm Ltd., 1981), pp. 27-50; Michael MccGwire, *Perestroika and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註⑨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18.

註⑩ *Ibid.*, p. 129.

註⑪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p. 4.

霍茲並未反對將文化視為一個影響國際結果之要素，其認為只有當權力被認為是達成目的之必要的時候，才主張以控制為前提下確認使用權力。權力的使用是指運用一個國家的能力企圖去改變他國的特定行為。權力只是所有影響國家行為中的其中一個不可被孤立的要素。⁸⁴戰略若不能達成國家目標就有可能被放棄，一個好的戰略能夠確保目標達成，並有效率地執行國家權力。在權力運作上，儘管影響戰略的因素有很多，但只有嚴謹的戰略規畫才是決定權力是否有效率的決定性因素。附帶現象戰略文化概念因此被認為能夠呈現，當企圖去達成結構現實主義者的國家目標時，從戰略文化的角度可以產生一個次佳的政策結果。⁸⁵

(二) 一般建構主義的戰略文化

如同前一類研究，建構主義者使用實證案例並結合因果理論來對特殊可認知的行為模式進行分析。代表學者有：伯格 (Thomas Berger)、巴內特 (Michael Barnett)、法瑞爾 (Theo Farrel)、卡贊斯坦與江憶恩。⁸⁶與前一類不同的地方在於，這類研究採取建構主義途徑企圖建立特定通則，其不僅視人類聯盟的各種結構主要是由共同分享的意念所決定而非是物質力量，而且視有目的之行為者的意念與利益是由共同分享的意念所建構並非是與生俱來的。⁸⁷在建構主義的影響下，這類學者認為「文化環境影響的不僅是不同類型國家行為之誘因，而且影響了國家的基本特質——這就是所謂的國家認同。」⁸⁸意念不僅是行為的規則或規畫，在國際上也可以實際地型塑行為者之行動。再者，其也可以認知到從信念 (beliefs) 與意念所產生之有規律的行為模式。⁸⁹一般建構主義者認為國際真實層面的構成是意念的，跟物質的一樣，都是處於個別行為者的層次，其對戰略文化的解釋亦是集中於運用因果理論結合經驗的認定來解釋特定的行為模式。

建構主義者假設國家利益與認同都是先驗的「外成的交互作用」(exogenous to interaction)。相反的，建構主義者認為國家利益與認同都是「內成的交互作用」(endogenous to interaction)，⁹⁰這個命題邏輯亦是建構主義分析國際關係的主軸。這類

註⁸⁴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91~192.

註⁸⁵ John Glenn, "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pp. 532~533.

註⁸⁶ 代表著作：除卡贊斯坦與江憶恩之外尚有 Thomas Berger,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and Michael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al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o Farre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Spring 2002), pp. 49~72.

註⁸⁷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

註⁸⁸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p. 33.

註⁸⁹ Theo Farrel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Spring 2002), pp. 50~56.

註⁹⁰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 394.

研究認為在國際環境的影響下，國家間行為還是會有不同的互動方式，不受到結構的影響。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中，國家間互動並不會產生本質上的安全困境與自助行為，所謂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所造成的。國家視他國為潛在威脅的認知，並非像所有認同一般，都是與生俱來的概念，自我與他者兩造都是社會所建構的。換言之，安全困境並非天生的，亦非由無政府狀態所產生，若一旦這兩難局勢被制度化後就可能很難去改變，但是由集體意義（collective meanings）所構成意念與利益則是不斷地在變化著。^⑩

第一代戰略文化的論點認為，社會規範與結構大致上限制了國家戰略的行為抉擇，文化實際上是行為者意念與利益的構成要素並非只是簡單的行為規則，而規範不再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它反而可以用來協助建立與界定這物質基礎。^⑪如同附帶現象的戰略文化研究，一般建構主義的研究並非是要取代結構現實主義，而是強調以文化認知為中介變項在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以補充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文化面向上研究的不足，所以這上述兩派研究與現實主義之間存有高度互補性。

二、與結構現實主義不相容的戰略文化研究

與現實主義不相容的戰略文化亦有兩類：一、「後結構主義者的」（post-structural）戰略文化研究，其目標是要將每個事件視為獨一無二的連續因果機制，以避開任何尋求對社會行為通則化之解釋。二、「詮釋的」（interpretivist）戰略文化研究，其目標強調研究者本身要沈浸於文化團體中才能瞭解他們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

（一）後結構主義的戰略文化

後結構主義者主要是圍繞著主觀意念來進行研究，並認為意念是被建構的而非是與生俱來的。^⑫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主張支配性的論述與社會實踐的建構都是主觀認知，代表學者有：拉彼得（Yosef Lapid）、德夫塔克（Richard Devetak）、瓦德斯（Jutta Weldes）與傑克遜（Patrick T. Jackson）等。相較於其他派別，這一派學者主張「論述」（narrative）不是簡單的對先前的事件作再次表述（re-presentation），而是藉以論述的方式為工具將實際的狀況表達出來。歷史論述也可表現出一種重要的政治功能，在當代政治衝突中其可以如資源一般被使用。^⑬此學派認為，對歷史政治事件支配性的理

註⑩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p. 402.

註⑪ Jeffrey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Articl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326-328.

註⑫ Yosef Lapid, "Culture's Ship Returns and Departur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 8.

註⑬ Richard Devetak, "Postmodern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164.

解以及對當代國家行為的觀點都是由社會行為者所建立，並且經常有助益於決策行為者追求本身的目標。所以決策者對事件的推論（discursive）再表述的過程並非是中立的過程，而是一個分離的部分，但卻又深深影響著現實決策過程中命名者（namers）與創造者（makers）的權力與權威。^⑤再者，後結構主義者對國家的歷史論述、國家迷思與象徵等等，都可以連結於國家對外行為的論述。

戰略文化被後結構主義者視為是一個多面向的資源，國家決策者藉此論述其國家行為之企圖，目的是為了使他們本身行為成為可理解的且合法化之行為。國家身分被視為由決策者主觀的語言權力與國家利益所構成。^⑥這合法化過程在特定國家行為中建構了國家身分，並在國際社會上被表現出來。換言之，後結構主義者強調國家菁英乃根據自身所處之環境，持續以工具性為目的運用語言權力來詮釋歷史事件、國家象徵、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等等。每一個被瞭解的政治事件都是由決策者企圖去控制複雜的決策互動網路所造成之結果。這複雜社會互動的安排，使得在各種政治事件研究中發展跨領域通則之企圖高度地被懷疑。就經驗研究途徑而言，這派學者質疑各種研究通則的可行性。他們只從事單一固定的經驗分析，企圖尋求政治結果之造成原因，並視因果關係為是「各種因果機制的連續：社會行動過程與模式之偶發性聚合方式所產生的結果。」^⑦

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外成的，是介於物質工具、物質利益與國家行為動力之中介角色，而後結構主義者認為權力是內成的是介於語言表達、文化意念與國家行為動力之中介角色。^⑧後結構主義者亦認為意念會影響政策結果，強調從文化資源上可以追溯到各種結果，他們也強調國家行為的發生是偶發性的過程，這導致他們研究焦點集中在不同的個案上並做主觀性的解說。這派學者僅致力在探討意念因素與結果兩者之間的連結，而非採取一個通則化的研究策略。^⑨因為存在著相當迥異在知識論上的差距，所以其與現實主義之間幾乎沒有互補的空間。

（二）詮釋的戰略文化

這學派的研究不做類似現實主義者的預測或解釋，也不將文化角色視為國家行為的因果變量。其主張在不同本體論的假設下分析不同形態的問題，並認為不同的方法

註^⑤ 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p. 30.

註^⑥ Jutta Weld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226.

註^⑦ 原文為：“Concatenation of causal mechanism: the contingent coming-together of processes and patterns of social action in such a way as to generate outcomes.” 參見：Patrick T. Jackson, *Civilizing the Enemy: Germa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6), pp. 41-43.

註^⑧ Janice B. Mattern, *Orde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205.

註^⑨ David Dessler, “Constructivism within a Positivist Social Sci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January 1999), p. 129.

與解答都是適當的。⑩在解釋國際社會時，因為獨樹一格 (*sui generis*) 的文化特質與主觀的因果論述，使得擁護詮釋概念的學者將「可否證」(*falsifiable*) 之通則化論述視為是一個錯誤的冒險。為了瞭解生活形態的內在秩序，他們採取解釋的 (*hermeneutic*) 或詮釋的 (*interpretive*) 方法，並將自己沈浸於一個文化中。⑪在對社會世界的研究上，其重點並非採取尋求法則的經驗科學，而是以詮釋方式尋找行為者的行為內在意涵。⑫

詮釋性的研究也就是第一代戰略文化研究的特色，這類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美蘇兩造戰略文化不同之處。這類研究主張「不同的政治與戰略文化主要面臨是特殊的地理戰略問題，藉由不同個別的歷史環境與獨一無二資產的特色，這將多少形成個人的抉擇。」⑬這派學者對戰略文化是採取較廣泛背景定義，認為它提供一個可瞭解而非解釋行為因果關係的背景。例如：葛雷界定美國戰略文化為「起源於對於使用武力的思想與行為模式，並且由國家歷史經驗、自我特色化之抱負，與所有特殊的美國經驗所驅動。」⑭由於對戰略文化的界定太過於寬廣，這因此導致此派研究學者與第三代學者之間發生研究辯論。江憶恩認為，若戰略文化是無所不在的背景，那就等於沒有戰略文化。學者普爾 (Stuart Poore) 認為，如同葛雷主張「文化無所不在，且存在每個體身上」；如此，視戰略文化為一個因果變量將毫無意義可言。⑮再者，這類研究學者主張應該在關於特殊戰略文化的個案中運用「密集描述」(*thick description*) 來進行較多的經驗研究，如此才能提出在現實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之外的不同解釋與看法。⑯例如：於 1993 年阿德門 (Jonathan R. Adelman) 與石之瑜教授合著的**象徵之戰：中國的武力使用**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一書中就認為，中國決策很大的因素是受到內在文化的制約，中國用兵的主要動力是為了要維護天朝制度的形象 (*the image of tribute system*)，因此中國擁有獨特的戰爭方式，以追求達成某種象徵主義 (*symbolism*) 為目標，並非以現實主義為依歸。⑰此著作認為這種以文化象徵為國家行為動力之要素是無法藉由理性主義或現實主義角度來理解的。

詮釋的戰略文化研究雖然與現實主義不相容，如後結構主義研究一般也不走向理論通則化，然而這類研究卻有助於我們從不同角度瞭解戰略文化，亦有助於學者對戰

註⑩ Peter Winch,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58), p. 75.

註⑪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0), pp. 82-91.

註⑫ *Ibid.*, p. 87.

註⑬ Colin S. Gra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n Interim Assessment. The Occasional* (Wiltshire: Strategic and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1997), p. 28.

註⑭ Colin S.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Fall 1981), p. 2.

註⑮ Stuart Poore, "What is the Context? A Replay to the Gray-Johnston Debate on Strategic Cul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2 (April 2003), p. 294.

註⑯ *Ibid.*, p. 284.

註⑰ Jonathan R. Adelman and Chih-Yu Shih,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3), pp. 27-30.

略文化進行比較分析。這詮釋途徑的興起似乎也告誡著，在戰略文化研究中，若執著在尋求認定國家行為與文化之間的因果關係時，會將導致對國際社會研究過分簡單化的危機。更甚者，單一實證個案的文化經驗可能不適用於其他事件，對國家的戰略文化認知不足，將會導致對國家戰略政策的誤解與誤判。

伍、戰略文化研究走向社會建構主義之初步探討

從上述分析可以瞭解到，戰略文化研究的發展主要呈現有兩種特色。第一、學者在文化歷史上發掘更多的題材加以研究，尤其是探討不同國家文明或價值體系相互衝突的時候，或看似非理性行為偏好時，運用戰略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分析國家戰略決策體系中的文化歷史價值。而這正是屬於第一代戰略文化與詮釋的戰略文化研究之主要特色。第二、戰略文化作為一個拓展中的領域，其概念的發展與相關理論（analogous theory）的浮現，這都在測試著戰略文化研究之兼容性，而這亦是一個概念走向建構理論的嘗試過程，更是第三代戰略文化與一般建構主義戰略文化研究之重要特色。

就理論而言，一般社會科學對理論的界定如下：①（一）理論是將事實組合起來的體系。（二）理論是行動指南。（三）理論是有關事物應然的連續描述。（四）理論是抽象的思維用以解釋現實世界。簡而言之，理論就是一套分析事實的工具。以主流現實主義為例，其理論發展與變量運用在實證研究上已經為大部分的國際關係學者所認同。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與現實主義命題的不斷被修正，使得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已經不僅僅是一套理論，而是一個典範（paradigm）。②基本上，霍茲最早將分析變量分為三個意念（images）層次：決策者、國家與國際體系。③這層次分析因而成為現實主義分析國際關係時的重要途徑，而學者對這三個層次不同程度的重視，乃是形成不同現實主義流派之主因。這建築在以物質要素為基礎之上的現實主義，文化意念要素並非是其理論構成要素，這使得戰略文化概念在探討國家行為時仍有論述的空間。戰略文化研究雖然已被認定是一個重要的領域，然而在主流結構現實主義的框架中，戰略文化仍然只是一個概念途徑（conceptual approach）。

戰略文化研究是一個跨學門的新興領域，它主要跨足於人文歷史與社會科學之間，所以很難去劃分其研究範圍與定位，也因此仍處於辯論中的概念階段。④在建構社會科學理論的前提下，自 1990 年代起，國際關係學者乃積極地朝著要將這概念發展

註① Theodore Coulombis and James H. Wolf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8), p. 31.

註② Jeffrey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c, "Is Anyone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 9.

註③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5.

註④ C. Dale Walton, "The Strategist in Context: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Thought, and the Pursuit of Timeless Truth,"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No. 1 (March 2004), p. 93.

成理論的方向努力。但是理論發展的瓶頸就在於無法明確對「文化」概念做通則式的界定，這使得戰略文化研究只能在不同領域基礎上進行各自表述。在探討國家行為之議題上，戰略文化這一變量究竟是屬乎獨立變量或是中介變量也仍然無一定論。更深入的說，若戰略文化可以被視為如同國際體系結構一般，是影響國家行為的主要獨立變量，再加上豐富的實證經驗（empirical experience）與分析驗證，那麼戰略文化研究發展就有可能對現實主義造成挑戰。但若戰略文化僅被視為是影響國家行為的獨立變量之一，或只是中介變量之一，那麼其目的就僅僅只能補充現實主義論述之不足。從戰略文化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發展來看，由於戰略文化尚未發展出如同現實主義一般的理論基礎，所以只能被視為對現實主義分析架構在意念文化面向不足的補充。

本文認為將戰略文化放置在主流現實主義框架中，其理論的發展空間會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若將戰略文化放置在「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理論架構基礎上，戰略文化研究則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而且也具有理論上的解釋力，分析如下：

第一，在本體論（ontology）的基礎上，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現實國際關係的存在與基本特徵是國家內成（endogenous）的「認知－文化」主觀互證（inter-subjectivity）所建構。^⑩社會建構主義因此認為，國際關係無政府狀態、自助行為與安全困境等都是由各國經「互為主觀認識」（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所造成的社會結構。^⑪此非物質的本體論觀點與非物質的戰略文化界定（請參考上表）正好不謀而合。^⑫因此，戰略文化在社會建構主義基礎上，有理由被視為研究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的一個獨立變量，而不再是現實主義架構中的中介補充角色。

第二，在社會建構主義本體論的前提下，有兩個重要假設：^⑬（一）國家互動的國際環境是兼具非物質與物質雙重取向；（二）此環境亦提供各國對各自利益與身分的界定，以及國家行為之偏好。比較上述假設與戰略文化界定可發現，兩者可以有著相互分享的核心概念，包括：（一）視國家為國際關係的主要分析成員；（二）國際關係是成員間非物質的主觀互動所建構；（三）這社會建構將會影響國家身分、利益界定與行為偏好。換句話說，國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分析單元，也是戰略文化的載體，國家戰略政策與行為就是戰略文化的表現。在建構主義的基礎上，一國的戰略文化可以說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互動中所建構的，而這會影響國家政策與行為偏好的產出。

註⑩ Friedrich Kratochwil and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f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4 (Fall 1986), pp. 753-775.

註⑪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 Make of It," pp. 391-425.

註⑫ 社會建構主義在探討國家行為者「主觀互證」之意義時，由於在關注知識論面向上的不同，因此包含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例如：過程追蹤研究、論述分析、內容分析、調查、實驗、參與觀察等等。在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這些不同的研究法亦有助於提供研究者能夠以多元的方法來探討戰略文化。參見：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4, No. 2 (December 2006), pp. 695-711.

註⑬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324-348.

第三，對於形成國家安全政策與戰略行為偏好而言，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有五個要點：⑩（一）一國環境中所具有的文化或制度要素塑造了該國安全戰略政策；（二）在國家所處的環境中，其擁有的文化或制度亦塑造了國家身分；（三）國家身分的改變都將對國家安全戰略與行為偏好造成影響；（四）國家身分會影響國際之間的結構性規範（interstate normative structure）；（五）反之，國家安全戰略與行為偏好會再生和再造文化與制度性結構。而這五個要點除了說明了文化要素可被視為是國家政策與行為的主要獨立變量，更說明了國家政策與行為產出也會影響文化要素的轉變。由此可知，從建構主義的視野出發，戰略文化是一個持續性動態的獨立變量，而非是一個靜態的獨立變量。

第四，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文化選擇是一種漸進式的「認知學習」（cognitive evolution）機制，⑪像是個體對個體，與世代對世代之間透過「社會學習」和「模仿」的互動方式，並藉此傳承著改變行為的意念要素。⑫而學習和模仿這兩種文化選擇機制之效果，則奠基於在國家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社會化」（socialization）與「內化」（internalization）的程度而定。在社會建構主義認知學習之觀點上，戰略文化的持續與變遷，則取決於國家單元在國際環境中社會化的過程。這認知學習制度的社會化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國家戰略行為趨同的過程，所以國家行為會有其相似性。

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中心概念，社會建構主義是以文化認知為其論述核心。再者，現實主義是將國家行為者視為是相對利益的追求者，國際制度的效用對國家而言是相當弱的。然而，社會建構主義則視國家為國際社會的角色扮演者，國際制度對國家有著較強的制約效用。⑬因此，在社會建構主義的基礎上，進行戰略文化研究必然考慮到國際制度對戰略文化的影響。理論上，基於不同國家環境特性（character of a state's environment）與政治競爭本質（contested nature of political identities），各國戰略文化在發展初期便是一個多元發展的表徵，然而經由進入國際社會化的過程中，在追求安全之原則下參與國際制度並受其制約，國家戰略文化與國家軍事戰略行為將會因此發生變遷，並導致各國的互動行為有著會趨同的特性。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自 1990 年代中期便開始對中國採取「建構式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戰略，企圖將中國拉入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中以改變其認知與行為模式，而非是僅僅採取現實主義式的圍堵對抗策略。⑭

註⑩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Summer 2001), pp. 553-588.

註⑪ 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3 (September 1997), p. 340.

註⑫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25.

註⑬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26 (January 2000), p. 11.

註⑭ William Perry, "U.S. Strategy: Engage China, Not Contain," *Defense Issues*, Vol. 10, No. 109 (October 1995), <<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1995/s19951030-kaminski.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9, 2012).

為要強化戰略文化研究的論述基礎，江憶恩曾以社會化的角度探討戰略文化持續與變遷之問題。他在《社會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中國》（*Social Stat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1980-2000*）一書中提出，社會化的過程在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中是一個重要論點，社會化過程是國家戰略文化演化的重要因素。戰略文化是從國際社會化過程中學習而來並且是可以變化的，而且會直接影響到國家戰略模式。他觀察 1980 年代以後的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經由社會化中的三個學習過程：⑩模仿（mimicking）、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與勸說（persuasion），不僅使得中國從孤立狀態進入國際社會，並受到國際社會制度所制約，進而影響中國戰略文化變遷，也規範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身分與其戰略行為模式。⑪但美中不足的是，以社會化探討戰略文化研究除江憶恩外，幾乎沒有任何相關著作。在國際社會化的過程中，戰略文化與國家行為的一致性究竟如何，這對於發展中的戰略文化研究來說仍是一個相當龐大的課題，需要大量的實證研究來佐證之。

總之，在社會建構主義為論述的基礎上，戰略文化可以被解釋為一套整合的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作為的認知與價值體系。這體系是在一個動態的國際社會化過程中，由國家與國際社會互動的結果，並會影響到國家在國際環境的決策與行動。在國際社會互動的過程中，這套認知與價值體系將會受到調整與傳承，國際安全制度的建構因而成為共同的認知價值，這個調整將使各國戰略決策與行為在不同認知與價值的體系上有著趨同的安全認知學習。⑫由此觀之，將戰略文化置於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其發展必然以建構理論並強化對國家行為之論述為依歸，這也就是第三代戰略文化研究努力的方向。在這趨勢之下，以傳統歷史途徑為研究方向的戰略文化研究將有可能式微。以社會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戰略文化研究不僅跳脫出了現實主義論述框架，也超越了人文歷史領域論述。然而，戰略文化是否能發展出更獨立與更明確的研究主體則有待持續研究觀察。

陸、結 論

在軍事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文化本身是無法直接觀察的，如同權力一般，其必須藉由一個國家的政策或行為才能呈現出來。再者，文化也不會直接對外在環境造成影響，其必須藉由以國家單元為載體才能有所作用，也才能被觀察。近年來，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方興未艾，戰略文化已經被視為是影響國家戰略行為或軍事安全的重要一環。隨著西方學者的努力，相關文獻已經具有相當的成果。但可惜的

註⑩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8), p. xxv.

註⑪ *Ibid.*, p. xviii.

註⑫ 在論述的基本命題上，現實主義強調個體主義，其認為在求生存之前提下，國家必須不斷地追求權力才能獲得或維持其安全。而社會建構主義則強調整體主義，其認為在求生存之前提下，國家會藉由社會互動與制度合作以獲得或維持其本身安全。

是戰略文化的發展還正處於一個百家爭鳴的狀態，不同學門對戰略文化有著不同的界定與分析，其理論發展走向亦正處於探索中。假使戰略文化能夠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發展出其理論，這將會強化學界對軍事戰略與傳統安全相關議題的解釋力。

與西方相比，國內對於戰略文化理論探討之相關文獻則相對較少，並且大多是以歷史觀點為基礎，將戰略文化等同於戰略思想或軍事傳統，疏忽了戰略文化是一個集體的特質。這與第一代戰略文化的研究方向相當雷同。例如：在國內對戰略文化最早的探討主要是由鈕先鍾教授所提出，他主張戰略文化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以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因素為淵源，其所表現出來的是「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唯明瞭一國的民族性後，才能瞭解其戰略思想。這觀念也影響了許多國內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⑩更甚者，國內對戰略文化的研究尚屬狹隘，主要還是集中在以中國為分析主體，並未涉及跨國研究與理論探討。所以戰略文化研究在國內未來發展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文化是一個無形的意念概念並非是一個有形的物質概念，在選擇具有信度與效度的研究變量之能力上，相較於一些發展已久的國際關係理論，還是顯得是相當不足。若戰略文化在理論上無法突破，其對國際關係與國家行為的解釋力也會相對受到限制，因而淪為概念性的描述。由於各個學門對於文化概念都有不同的解釋，這分歧的概念使得戰略文化研究很難發展成如同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一般的理論或典範。此外，戰略文化的概念是一個從人類學與社會學移植到國際關係領域的概念，因此在建立理論與其適用上都存有困難度，所以本文認為在國際關係領域的戰略文化研究必須依附於具有相同本體論與知識論的大理論上才能具有深度的分析基礎。在以社會建構主義為理論之基礎上，戰略文化研究不僅可以強化其論述以突破目前的局限，亦可被理解為是一個在國家內外環境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一個具慣性的動態戰略意念認知體系，它不僅是一個不斷累積的社會遺產，也是一個社會與時代互動下之產物，更是國家單元經由國際社會化與內化過程之後所造成的一套指導國家行為的戰略價值觀。

最後，戰略文化研究與社會建構主義的本體論之契合度相當一致，而以社會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戰略文化研究還正處於嘗試階段，但這方向似乎也指出了戰略文化研究朝向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第一步。儘管當前戰略文化研究多元化的發展的確提供了國際關係領域有著不同的戰略文化視野，但是要作為一個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新興的研究取向，就要能夠對國家戰略文化與國際體系之間的互動過程有著更充分的解釋力與實證經驗，重要的是必須強化戰略文化的理論根基。在未來以社會建構主義為基礎的戰略文化研究是否能產生豐富的文獻，並且提升其對國際關係安全戰略與軍事議題的解釋力，這仍值得後續的觀察研究。

註⑩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臺北：黎明，1989年），頁23。鈕先鍾的觀點與中國大陸戰略文化學者李際均的看法相似，其認為戰略文化是歷史與文化傳統所形成的戰略思想與戰略理論，並據此以指導戰略行為和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潮。參見：李際均，「論戰略文化」，*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1期（1997年1月），頁238。

airiti

120 問題與研究 第51卷 第4期 民國101年12月

*

*

*

(收件：100年6月24日，接受：101年3月8日)

Contending IR Studies on the Field of “Strategic Culture”

An-Hao Hu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Top University Program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highlighting the problem of its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The research of IR strategic culture stemmed from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ways of war by many military-historical scholars and started to emerge since the 1970s. The main research purpose of strategic culture is trying to look at the ideational origin of state behavior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y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under the dominance of the main stream structural realism. Recently, although the literature on different countries' strategic culture is abundant, we still do not have a common conception and methodology for strategic culture studies, which rendered studies on state strategic policies and behavior via cultural concept weak and contending. This paper therefore tries to revisit and review the research of strategic culture by exploring its evolutio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its future application in the realm of IR.

Keywords: Strategic Culture, State Behavior, Ways of War, Structural (Neo-) Realism, Social Constructivism

參考文獻

- 石吉雄，價值與現實的匯流：中共武力使用的戰略文化內涵（臺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 江信良，中共積極防禦戰略－從戰略文化探究（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 李際均，「論戰略文化」。《中國軍事科學》（北京），第 1 期（1997 年 1 月），頁 8~15。
- 沈明室，「中共軍事研究的戰略文化途徑」，《國防政策評論》（臺北），第 5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頁 108~135。
- 林棟義，中共對外動武模式之研究－從戰略文化途徑研究探討（臺北：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論文，2010 年）。
- 梁震宇，「我國戰略文化之淺析」，《陸軍學術雙月刊》（臺北），第 47 卷第 518 期（2011 年 8 月），頁 24~34。
- 莫大華，「中共戰略文化初探」，《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39 卷第 5 期（1996 年 5 月），頁 38~52。
- 莫大華，「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問題與研究》（臺北），第 35 卷第 6 期（1996 年 6 月），頁 39~52。
- 莫大華，「戰略文化與國防政策－中華民國的戰略文化與軍隊文化」，《國防政策評論》，第 1 卷第 4 期（2001 年 4 月），頁 33~56。
-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臺北：黎明，1989 年），頁 23。
-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臺北），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7~230。
- 楊仕樂，「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王道』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38~1842」，《中國大陸研究》，第 54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27。
- 劉順銘，從戰略文化觀點探討中共軍事戰略與用兵動因（臺北：國防管理學院，國防決策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 Abdelal, Rawi,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4, No. 2 (December 2006), pp. 695~711.
- Adelman, Jonathan R. and Chih-Yu Shih,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3).
- Adler, Emanuel,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3 (September 1997), pp. 319~363.
- Adomeit, Hannes, "Soviet Risk Taking and Crisis Behaviour," in John Baylis and Gerald Segal, eds., *Soviet Strategy* (London: Croom and Helm Ltd., 1981), pp. 27~50.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Arnett, Robert,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Nuclear War: Do They Really Think They Can

- Wi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Research*, No. 2 (September 1979), pp. 172~192.
- Bakshi, G.D., *The Indian Art of War: The Mahabharata Paradigm* (Delhi: Sharada, 2002).
- Baxter, William P., *The Soviet Way of Warfare* (London: Brassey's, 1986).
- Baylis, John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ooth, Ken and Russell Trood, eds., *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Macmillan, 1999).
- Booth, Ken,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London: Croom Helm, 1979).
- Burchill, Scott,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 Checkel, Jeffrey 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Articl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324~348.
- Checkel, Jeffrey T.,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Summer 2001), pp. 553~588.
- Coulombis, Theodore and James H. Wolf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8).
- Danchev, Alex, "Liddell Hart and the Indirect Approach,"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3, No. 2 (April 1999), pp. 313~337.
- Das, Runa, "Strategic Culture, Identity and Nuclear (In) security in Indian Politics: Reflections from Critical Constructivist Lens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7, No. 5 (September 2010), pp. 472~496.
- Desch, Michael,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41~170.
- Dessler, David, "Constructivism within a Positivist Social Sci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January 1999), pp. 123~137.
- Devetak, Richard, "Postmodern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61~187.
- Dueck, Colin,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 Duffield, John S.,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ur: Why Germany Confounds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Vol. 53, No. 4 (September 1999), pp. 765~803.
- Duffield, John S., Theo Farrell, Richard Price, and Michael C. Desch, "Correspondence – Isms and Schisms: Culturalism versus Realism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156~180.
- Dunne, Tim and Brian C. Schmidt, "Re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84~99.

- Ermarth, Fritz W., "Contrasts in American and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 No. 2 (Autumn 1978), pp. 138~155.
- Evera, Stephen Van,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ummer 1984), pp. 58~107.
- Farrell, Theo,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1 (Spring 2002), pp. 49~72.
- Garthoff, Raymond L., *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0).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George, Jim,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 Glenn, John, "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September 2009), pp. 523~551.
- Glenn, John, Darryl Howlett, Stuart Poore, and Darryl A. Howlett, eds., *Neo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 Gray, Colin S.,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Fall 1981), pp. 21~47.
- Gray, Colin S., "Strategic Culture as a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Spring 1999), pp. 49~69.
- Gray, Colin S., *Modern Strate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ray, Colin S.,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tyle* (Lanham: Hamilton Press, 1986).
- Gray, Colin 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An Interim Assessment. The Occasional* (Wiltshire: Strategic and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1997).
- Harrison, Richard W., *The Russian Way of War: Operational Art, 1904-1940*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 Hart, Liddell, *Deterrent or Defense* (New York: Praeger, 1960).
- Hart, Liddell, *Foch: The Man of Orleans*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31).
- Hart, Liddell, *Serman: Solider, Realist, American*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29).
- Hart, Liddell, *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London: Faber & Faber, 1932).
- Hart, Liddell, *The Liddell Hart Memoirs*, 2 volum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 1965).
- Hasenclever, Andreas,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26 (January 2000), pp. 3~33.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0).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 Jackson, Patrick T., *Civilizing the Enemy: Germa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Wes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6).
- Jacobsen, Carl G., Ken Booth, and David R. Jones,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Jepperson, Ronald L.,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75.
- Johnston, Alastair I.,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 Johnston, Alastair I.,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 Johnston, Alastair I.,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 Johnston, Alastair I., *Social Stat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8).
- Jones, David 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n Carl G. Jacobsen, Ken Booth, and David R. Jones,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5~49.
- Katzenstein, Peter J.,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Kier, Elizabeth,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65~93.
- Kierman, Frank A.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Klein, Bradley S.,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14 (April 1988), pp. 133~148.
- Klein, Bradley S., "The Textual Strategies of Military: Or Have You Read Any Good Manuals Lately,"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pp. 97~109.
- Klein, Yitzak, "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1 (April 1991), pp. 3~24.
- Kratochwil, Friedrich and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f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4 (Fall 1986), pp.

753~775.

- Lantis, Jeffrey 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 No. 1 (Fall 2002), pp. 87~113.
- Lantis, Jeffrey S., "Strategic Culture: From Clausewitz to Constructivism," *Strategic Insight*, Vol. 4, No. 10 (October 2005), pp. 1~16.
- Lapid, Yose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 Lapid, Yosef, "Culture's Ship Returns and Departur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6), pp. 3~20.
- Legro, Jeffery W., "Military Culture and Inadvertent Esca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Spring 1994), pp. 108~142.
- Legro, Jeffery W.,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egro, Jeffrey and Andrew Moravcsic, "Is Anyone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 Lock, Edward, "Refining Strategic Culture: Retur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3 (July 2010), pp. 685~708.
- Longhurst, Kerry,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ord, Carles, "American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5, No. 3 (July 1985), pp. 169~293.
- Luckham, Robin, "Armament Culture," *Alternatives*, Vol. 10, No. 1 (January 1984), pp. 1~44.
- Mattern, Janice B., *Orde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 McCwire, Michael, *Perestroika and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 Morgan, Forrest E., *Compellence and the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 Implications for Coercive Diplo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stport: Praeger, 2003).
- Perry, William, "U.S. Strategy: Engage China, Not Contain," *Defense Issues*, Vol. 10, No. 109 (October 1995), <<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1995/s19951030-kaminski.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9, 2012).
- Poore, Stuart, "Strategic Culture," in John Glenn, Darryl Howlett, Stuart Poore, and Darryl A. Howlett, eds., *Neo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p. 45~69.
- Poore, Stuart, "What is the Context? A Replay to the Gray-Johnston Debate on Strategic

- Cul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2 (April 2003), pp. 279~284.
- Rose, Gide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p. 144~177.
- Schweller, Randall, *Deadly Imbalance: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howalter, Dennis E., “From Deterrence to Doomsday Machine: The German Way of War, 1871-191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 64 (January 2000), pp. 679~701.
- Snyder, Jack,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Ken Booth, and David R. Jones, eds.,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 pp. 3~9.
- Snyder, Jack,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97).
- Sondhaus, Lawrence,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 Uz Zaman, Rashed, “Strategic Culture: A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Wa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8, No. 1 (March 2009), pp. 68~88.
- Walton, C. Dale, “The Strategist in Context: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Thought, and the Pursuit of Timeless Truth,”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3, No. 1 (March 2004), pp. 93~99.
- Waltz, Kenneth,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Weigley, Russell,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 Weldes, Jutta,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 Weldes, Jutta, Mark Laffey, Hugh Gusterson, and Raymond Duvall, eds., *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19~426.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nch, Peter,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58).
- Wivel, Anders, “Explaining Why State X Made a Certain Move Last Tuesday: 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Realis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No. 8 (December 2005), pp. 355~380.